

亚述人尚武文化论析

李海峰¹, 刘期亮²

(1.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市 400715; 2.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市 300071)

摘要:亚述人是古代近东地区以尚武著称的古代民族。公元前9—7世纪,亚述人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其军队在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建立了人类进入铁器时代后第一个地跨亚非的大帝国。亚述人的尚武文化既是亚述人得以建立强大帝国的最主要因素,同时也是亚述帝国走向灭亡的罪魁祸首。亚述人的尚武文化及其实施的一系列征服行动,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近东的历史发展进程。

关键词:亚述人;尚武;古代;近东地区;公元前19—7世纪

中图分类号:K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67-06

亚述人是讲塞姆语的民族,因生活在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地区而得名。亚述人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民族,其独特的尚武文化,使其在人类历史长卷中抹上了浓重的一笔。但亚述国家建国伊始,并非是以武立国,而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其走向轻农耕、重商战的发展道路。亚述人尚武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其走向帝国的过程,二者相生相伴、相互促进。亚述人尚武文化成就了其帝国的辉煌,同时也将帝国拖入了深渊,走上了灭亡。本文拟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对亚述人尚武文化的表现、形成因素及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从而使人们更好地认知亚述人的尚武文化,更深刻地了解古代近东的历史与文化。

一、亚述人尚武文化的表现

以战争为主要内容、尚武、黩武的文化几乎占据一个国家文化的全部,在古代近东地区以亚述人表现得最为突出。亚述人的尚武可谓是典型的“单一的战争艺术取得了进步,却牺牲了许多和平艺术”^{[1]189}。亚述人尚武文化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多种多样。亚述人的战争艺术及亚述帝王的军事才能是亚述人尚武文化最突出的表现。

(一)亚述人的战争艺术

“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鼓励了战争,因为河谷的富饶产生了财富,而财富,反过来,刺激了竞争与贪婪。”^{[2]401}与其他文明不同,两河流域文明战争、混乱是常态,而统一稳定则是非常态,两河流域地区不断上演着征服与反征服之间的斗争。亚述人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将战争艺术发挥到极致的一个民族,对于占据地理优势的北方亚述人而言,掠夺东、西及南方的财富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公元前9—7世纪的亚述人凭借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和极强的征服欲望,不断向外出击,征服了整个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及埃及,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

亚述王宫的浮雕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亚述人的战争艺术。富兰克弗特认为亚述人的“浮雕展

* 收稿日期:2013-05-27

作者简介:李海峰,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亚述时期财产买卖与借贷活动研究”(SWU1309109),项目负责人:李海峰。

现了亚述人最伟大且最原始的成就,事实上,亚述艺术史主要是浮雕雕刻的历史”^{[2]341},战争是亚述浮雕艺术作品中永恒的主题;通过这些浮雕,我们可以领略亚述人气势恢宏的尚武精神。莱亚德在他的著作《尼尼微及其遗迹》一书中描绘了一块亚述军队对一座敌人城堡进攻的浮雕:“当向上攀登的士兵以强大的攻势进攻城墙时,战俘也被带进监牢。艺术家的眼光和手还捕捉到了这种人为暴力与痛苦的自然背景:对战争无所谓的树木与鱼群。”^{[2]342}在另一块描绘战争场面的浮雕中,艺术家描绘了众多战争细节,防御的城墙遭到一队亚述攻城槌手的进攻,弓箭手们正向防守的士兵们射箭,此外雕刻家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一些战俘被钉死在木桩之上。又如尼尼微宫殿的一块浮雕上,阿淑尔巴尼帕及王后在一次花园聚会上尽情享受快乐,在细细品味优雅音乐旋律之时,旁边的一棵树上却悬挂着被砍下的敌国国王的头颅。如此主题类似的浮雕在出土的亚述王宫浮雕中不胜枚举。

亚述王宫的浮雕画面表达的意蕴与精神就是势不可挡的战争与征服。无论是战斗还是狩猎的场面,这些雕刻作品所展现的,要么是残酷的屠杀敌人,要么是与狮子的搏斗,这些场景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一种“残酷的喜悦”。亚述人的战争与屠杀是这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其用意是让亚述的君王们充满信心,并用威慑力令百姓臣服。国王们一成不变的雕像,象征着权势不可改变以及亚述统治的持续性。除了阿淑尔神是亚述人心目中不朽的信仰之外,赢得战争也许就是亚述人最现实、最虔诚的信仰。为追求这种“残酷的喜悦”,亚述人想尽一切办法,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去武装他们的军队,来达到最佳的征服效果。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第三进行了军事改革,增加了工兵、辎重兵、创建骑兵和战车兵等兵种;在武器方面,亚述人发明了合成弓,引进马匹,发明攻城槌等;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采取效率极高的围攻战和心理战等。这些军事创举使亚述帝国的军队在西亚地区屡战屡胜,所向披靡,使帝国国威远播四方。军队是亚述尚武文化的最佳载体,战争是这种精神和文化的表现形式,而最能体现亚述人尚武文化的表现手法,则是他们实行的残酷的心理战术。

(二)亚述人残酷的心理战术

亚述人发动的心理战,其手法之残忍,用恐怖主义来形容毫不为过,甚至有人认为现代恐怖主义的肇端来源于亚述人。亚述人在战争中常常对被征服的人们实行暴力威慑的残酷心理战。如辛纳赫里布攻占耶路撒冷时,“他的代表用亚述语对这座城市的官员们发表了讲话,敦促他们臣服亚述的强大力量。可是当官员们表示拒绝时,这位亚述王代表转身对城墙上的守城士兵大声叫喊,用希伯来语直接告诉他们他们所知道而他们的头领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们的事情”^{[2]408}。亚述人在征服过程中,会频繁地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容易攻占的小城市,在征服之后他们把城市彻底拆除,并放火焚烧。如辛那赫里布战争记里面这样记载:“我围困了、征服了、摧毁了、拆除了他的王城马如比什图城和阿库杜城,以及它们周围的 34 座小乡镇,我用火烧了他们。”^{[3]349}亚述人对征服的居民采用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他们用人皮和人头来装饰城墙。“我砍断他们的脖子如同砍献祭的羔羊,我割断他们的喉咙如同砍一条线,我让他们的血如同雨季的大洪流流淌在广阔的地面上。我使他们战士的尸体像青草一样覆盖平原,我割下了他们的下唇,毁了他们的容貌,如同摘成熟的黄瓜,我切下了他们的手。”^{[3]370}亚述人的这种凶残的屠杀政策给被征服民族造成了极度的心理恐惧。亚述人有时候也不屠杀俘虏,而是弄瞎他们的眼睛,然后释放他们。从公元前 13 世纪开始,亚述人为防止被征服的人以后造反,对他们采取了民族迁移政策,到公元前 9 世纪末,大规模的迁移已成基本国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同他们的本土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相脱离,从而失去反抗的精神,逐渐成为亚述的臣民,进而更好地将他们控制起来,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剥削、奴役他们”^[4]。

(三)亚述帝王尚武的才能与品性

在亚述王国,国王是最高的军事统帅,由一位或多位神灵时刻保护着。亚述最重要的神是阿淑尔神,而国王则是阿淑尔神在人间的代理,巩固国王的统治则是阿淑尔神最主要的职责。阿淑尔神

具有极大的权威，“他征服了所有的不服从者，他驱散邪恶，他惩罚那些不畏惧他的话的人，罪恶者难逃他的法网”^[5]。因此，作为阿淑尔神代言人的亚述国王常常神化他们的使命，认为他们的对外战争是“圣战”。履行神的意志，这种观念为亚述帝国的扩张提供了一种动力，并在亚述民族中形成了一种尚武的精神与传统。亚述军队以阿淑尔神的名义南征北战，凭借着对神明的无限忠诚，取得了无数胜利。亚述国王也正是通过四处征战，确立起了至高的威望。这样，神的意志，加上统兵作战，造就了一个个冷酷无情、坚忍不拔的亚述国王。他们野心勃勃，精力充沛，能征善战，残酷无情，正因亚述帝王具有如此强悍的才能品行，才使亚述从一个地区小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

沙姆西阿达德是首位将亚述地区统一的亚述王。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他控制的范围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扎格罗斯山，如果再加上同盟国，这一范围可达到地中海滨，沙姆西阿达德的铭文记载：“我把刻有我伟大名字的石碑，立在大海之滨的黎巴嫩。”^[6]此时的亚述王国成为两河流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沙姆西阿达德死后，他以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帝国迅速瓦解了，亚述人长期处于分裂衰落的状态，直到米坦尼的衰落他们才再度崛起。米坦尼的衰落给亚述人提供了一个发展自身的良机，进入中亚述时期之后，一个接一个精力充沛的亚述王力争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与埃及、赫梯、巴比伦并列的强国。从阿淑尔巴里特开始，亚述人开始了对外扩张。阿达德尼腊瑞之后的两个王沙勒马纳沙尔第一和图库勒特尼努尔塔第一时期是中亚述发展的鼎盛时期。亚述军队在这两位国王的率领下，灭亡了米坦尼，打败了加喜特巴比伦，疆域扩展到亚述历史上的最大范围。但阿淑尔拜勒卡拉之后，中亚述步入衰落。然而，阿淑尔拜勒卡拉及其父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第一对外作战的胜利，使得亚述在强大的外族入侵中生存下来，为两个世纪后亚述人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础。公元前934年，从阿淑尔丹第二开始，亚述人再度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从此时到公元前612年亚述灭亡的300多年间是亚述人最为强盛的时期。在此期间，亚述诸王带领军队横扫整个近东地区，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阿淑尔丹第二和阿达德尼腊瑞第二是亚述再度中兴的两代王，他们挣脱了亚述之敌的束缚，揭开了亚述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一页。其后的阿淑尔纳西尔帕第二是新亚述霸权的主要建树人，他的努力，使亚述从地区强国向帝国转变。他为亚述未来的军事国王们树立了一个标准，他“拥有一切他的继承者们所具有的素质和缺陷的极致，是冷酷无情，坚忍不拔的帝国缔造者，野心勃勃、精力充沛、英勇威猛、高傲自负、残酷无情以及雄壮辉煌”^{[2]120}。公元前8世纪到7世纪，亚述帝国为萨尔贡第二及其后继者所统治，被称作“萨尔贡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对于整个近东历史来说就是“亚述人的世纪”。萨尔贡第二扫平西方和南方，击溃北敌；辛纳赫里布四战埃兰，三平巴比伦；阿萨尔哈东抚平米底，征服埃及；阿淑尔巴尼帕第二攻陷底比斯，侵占埃及，三入苏萨，摧毁埃兰。萨尔贡王朝的历代诸王将亚述帝国的疆界扩展到最大极限，并使亚述文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发展最高峰。

从亚述王宫浮雕的主题内容、亚述军队的作战方式及国王的才能品性都可以看出，亚述人热衷于征服战争，并享受战争。国王是阿淑尔神意志的执行人，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更重要的是亚述王身上凝聚着整个亚述民族为战争而生存的不朽灵魂！

二、亚述人尚武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亚述国家的诞生，最初并非以军事立国，而是以贸易立邦。公元前2000年代的古亚述城邦时期，亚述人是以商业和贸易发达著称，这一时期亚述地区是近东地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根据小亚细亚的卡尼什城发掘出的大量泥板文书的记载，学者们形象地描述了古亚述时期阿淑尔城商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小亚细亚之间贸易的情景：“阿淑尔城商人的驴队从阿淑尔城出发，满载着货物，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沿着陶鲁斯山脉，到达小亚细亚的卡尼什城。在这里他们把货物转卖给本地和其他地区的商人。……阿淑尔城的商人运往西方的主要贸易商品为羊毛织物和锡，运回的则为银和金。”^{[7]231}亚述人还以对外殖民贸易而闻名。亚述人沿着他们的贸易路线，在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平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建立了许多商业殖民点,被称为“港口”,以及一些小的定居点“瓦尔巴图”,以定居点为纽带,公元前 19、18 世纪,亚述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和安纳托利亚形成一个广大的贸易网,这不仅成为两河流域与西方交流的通道,也是后期亚述对外扩张精神的一种体现。亚述早期的商业和贸易发展,为后来亚述的军事扩张奠定了基础。

亚述人对商业和贸易是非常重视的,其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如上所述,即使到了公元前 1000 年的帝国时代,商业活动也是亚述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你发展商贾,多过天上的星星”,从犹太先知的这句话中即可见一斑。然而,不论是早期的商业发展立邦,还是后来以武力扩张取代商业发展而缔造帝国,亚述人选择如此“轻农耕,重商战”的立国之道,究其原因,主要是亚述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然。

“美索不达米亚始终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文明而繁荣,但缺乏自然屏障,这吸引了山民和平原居民,他们可以轻易地进行掠夺。”^{[8]87}以阿淑尔城和尼尼微城为中心的亚述本土位于两河流域北部。这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是北方山区“野蛮民族”和叙利亚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路,也是南部巴比伦尼亚到地中海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要冲,更是亚述地区同小亚细亚之间贸易路线的起点,但是,这里缺少耕地和其他人类生活必需的资源,如木材、金属和良种马匹等,亚述人必须发展对外贸易才能使该地区繁荣富强。连接西亚东西南北的重要地理位置,对于亚述人来说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因此,在强族林立的古代西亚地区,亚述人为图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从事商业贸易。从事商贸,不仅补充了亚述地区缺少的重要资源,使亚述人赚取了大量财富,而且还在亚述以外的地区建立了贸易殖民点,这些都使亚述民族富足和强盛起来。此外,从事商贸活动,还使亚述人养成了喜欢冒险,讲究实用,追求效益的品质,锻炼出了亚述民族坚忍不屈的性格,也刺激了亚述民族向外扩张的野心。

从另一方面来看,便捷的地理条件既为亚述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使他们的生存面临威胁。交通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样,亚述地区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也是古代西亚各强国及周围其他游牧民族竞相争夺和控制的地区。而亚述本土周围没有天然的屏障,使其很容易遭受四周野蛮民族的袭击和统治,从公元前 19—14 世纪,亚述先后受到埃什嫩那、马瑞、古巴比伦和米坦尼的征服与统治。除这些文明王国对亚述的威胁外,北部和东部山区的“野蛮民族”也时时威胁着亚述地区。亚述国王的一项常规任务就是要不断的征服北方和东方的野蛮民族。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八次战争铭记里详细记载了国王征服周边野蛮民族的战争情况。因此,从地理环境上看亚述不但要面对国内土地和资源紧张的困境,同时要面对东、北及西面游牧民族的进攻威胁,而南边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则是传统的军事强国,一有机会他们就北上征服,这些无疑都给亚述人的生存蒙上了阴影,从而养成了亚述人好战的性格。

公元前 14 世纪,亚述在阿淑尔巴里特统治时期,借米坦尼衰落之机而独立。亚述取得独立之后,发展军事力量来保持民族独立成了必然,尤其是不得使用武力去保护那些亚述人苦心经营起来但易受侵袭的商业贸易路线和商业殖民点,因为这些贸易路线和商业殖民点是亚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和获得重要生存物资的最重要的通道和来源。易受侵袭的地理位置,使亚述人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而要永久地解除周围民族对亚述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使这些民族臣服于亚述,置于其统治之下。“公元前一千纪,亚述军队每年向上游的亚美尼亚山村和下游的西方进行扫荡,是为了持续而系统地使山民处于自己的控制当中,因为如果无限地允许他们退回到遥远的山谷里,使他们永远臣服便是不可能的。有效地控制边界地区以便在那里迎接侵略也是必要的。总之,帝国主义是和平的唯一保证。”^{[8]69}因此,军事上的不断壮大是位于易受侵袭的亚述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战争给亚述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只要在战争中获胜,就会得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源源不断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对于亚述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必需的资源。以往获得这些资源的方

式主要是通过商业贸易,如今,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取这些资源,比通过商贸来得容易和便捷的多。更何况,战争胜利还使亚述人控制了被征服地区的商贸路线及建立更多的贸易殖民点,从而垄断这些地区的商业贸易。亚述为了维持通过征服战争而增加的各种利益,以及养活国内不断激增的人口,就不得不扩充其军事力量,用最先进的技术武装他们的军队,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这似乎是亚述人不得不进行的一种循环。出土的考古学资料表明,亚述人对这种“不良循环”一直乐此不疲,直至帝国的灭亡。亚述独立之后,战争成为亚述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对于亚述人来说,战争是一种生产方式,而非消耗,尽管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其他民族的苦难之上。尚武、黩武的精神与传统就这样在亚述民族中形成了。

三、亚述人尚武文化的历史影响

事实上,尚武并非亚述人的专利,尚武是古代近东地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只是亚述人将这种精神和文化发挥到了极致而已。古代近东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使尚武、黩武成为亚述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亚述人形成了尚武的立国之道。

这种尚武的立国之道,对亚述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亚述人通过军事征服,扩大了其商贸的势力范围,掠夺的大量财富及被征服地区上交的贡品,使亚述很快强大起来,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而另一方面,亚述人的崛起是建立在灭亡周边弱小国家,奴役被征服民族,掠夺他们财富的基础之上。亚述人的征服为自己树立了众多的敌手,这些被征服地区无不对亚述人充满了仇恨,他们时刻准备着推翻亚述人的统治,一有机会就揭竿而起,这为以后亚述帝国的解体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事实上,亚述帝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被征服民族实行残酷镇压、涸泽而渔的剥削方式,“一座城市被亚述人占领之后,征服者马上铲平该城以消除城内居民的进一步抵抗”^[9]。对于被征服地区,亚述人或者毁灭这个地区而把它的成员分散到其它地方,或者把它的公民全体灭绝,这属于亚述残忍的心理战内容,当然也是其骨子里尚武、黩武的理念与精神驱动之使然。实行这种大屠杀式的民族征服政策,其结果是“除了人力物力破坏和激起更强烈的反抗之外,不能得到什么更多的东西”^[10]。另外,亚述人对被征服的民族还实行大规模的迁移和流放政策,这样做虽然在政治上给帝国带来暂时的稳定,但是民族整体被迁移或流放,除一次性掠夺来的战利品外,这些被征服地区则失去了可持续剥削的价值,因为人已经被整体迁移或被流放该地区后,意味着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就被连根拔除而遭彻底破坏了。同时大规模迁移和流放被征服的民族,意味着亚述帝国政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来安放这些被征服的民族,消耗了帝国的财政收入,这种政策达到的效果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亚述帝国的穷兵黩武,使亚述军队所到之处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给被征服的民族带来灾难。由好战精神培育出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军队不停地对外征服,帝国就如开启的战车,无法停止其狂奔的脚步。“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11]当被征服地区的财富被掠夺殆尽,而亚述人想再向外扩张而鞭长莫及时,这个靠战利品和被征服地区的贡赋而“养活”的军事帝国便开始变得衰弱不堪。

亚述的尚武,正如汤因比所言,是一种军国主义,而“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文明解体的最为普遍的原因。军国主义摧毁文明的方式就是使整个社会已经联结成一体当地国家陷入到毁灭性的自相残杀之中”^{[1]189}。“从阿达德尼腊瑞三世开始,一些高官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历经了几代国王,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土地高度集中在豪强手中,地方经济的独立现象造成了亚述本土经济的崩溃。许多奴隶制的大庄园都被免除了兵役,而大批平民……负担过重,或逃亡……或依附于豪强的奴隶主庄园,从而造成了亚述帝国的兵源枯竭。这些地方割据势力握有重兵,拒绝听从亚述中央政权的调遣,并参加争夺王位的斗争。”^{[7]263}亚述的尚武好战最终受到了其作茧自缚般的报应。当

它昔日雄风不再而衰落之时,那些曾经被他的铁蹄蹂躏过的周边民族便联合起来向亚述进行了进攻与报复。亚述帝国晚期,一些敌对的民族如米底人、迦勒底人、西徐亚人的力量不断发展,他们联合起来向亚述进攻,在大敌当前之际,王族和贵族仍尔虞我诈、拥兵自保,各省竟不“出师勤王”。公元前612年,迦勒底人和米底人结成了军事联盟,摧毁了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二肃清了亚述最后的残余势力,控制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标志着亚述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综上所述,通过对亚述人尚武文化的表现、形成因素及其影响三个方面的论述,得以窥见亚述尚武文化之形成,不单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因素使然,确保自身的生存和追求最大化的政治经济利益,是亚述走向尚武道路的最根本原因。亚述人的尚武虽然给其他民族造成了沉重的伤害,但是亚述的尚武客观上对古代近东地区的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它实行的民族迁移和流放政策,“改变了古代近东地区长期由于地理条件而导致各个民族之间独立分散,难以互相交流的格局,对整个近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2],它促进了近东地区各民族的融合,为日后波斯人统一整个近东地区奠定了基础,亚述帝国的遗产也大多被波斯人继承。亚述帝国留给今天的精神遗产,也许从伊斯兰教中的“圣战”理论还可略感其意。虽然今天的人们并不推崇尚武与战争,然而对于亚述人来说,正是尚武与战争才使这个民族先于其他民族建立了人类进入铁器时代地跨亚非的大帝国,从而缔造了亚述民族“残酷的辉煌”。

参考文献:

- [1] 汤因比. 历史研究·上卷[M]. 郭小凌,等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2] 伯特曼. 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 秋叶,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3] 吴宇虹,等. 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举要[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4] 霍文勇,吴宇虹. 新亚述帝国时期民族政策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2):43-49.
- [5] A. 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 C. I(1114~859 BC)[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194.
- [6] B. J.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 Text[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274.
- [7] 刘文鹏,吴宇虹,李铁匠. 古代西亚北非文明[M].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 [8] 富兰克弗特. 近东文明的起源[M]. 子林,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 [9] J. N. Postage, 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M].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252.
- [10]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 世界上古史纲(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6.
- [11] 斯塔夫理阿诺斯.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 吴象婴,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7.
- [12] H. W. F. Saggs, 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M]. London,1984:268.

责任编辑 张颖超

Sharing and Difference: Popular Religion in Beijing of the Ming Dynasty

GAO Shou-xian(125)

The many temples in Beijing of the Ming Dynasty ca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ith different nature. Among them, some were worshiped by government, some by common people, but this was not the clear demarcation between orthodox and unorthodox worship. In daily life, various religious factors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us becoming a common religion. This was the popular religion shared by all social strata. The popular religion wa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from national etiquette to daily life. Pray, worship, pilgrimage in festivals at home or some particular religious place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direct, concentrated practice of popular religion. Starting from the mid Ming Dynasty, in order to pilgrimage to the temple,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association of pilgrims, with increasing scales and more complicated organizations. The popular religion was shared by all social strata, but its interior was not mixed together completely, often show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classes and social strata.

Personal Farming and Civilian Clothing:

Township Officials' Cultural Attire and Multiple Fac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U Qi MA Jun(136)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value choice and way of life we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But the social change also brought about widespread anxiety, and the Township Officials' social roles and identities became complicated and uncertain. Therefore, they borrowed the role of other social groups to seek their value. They kept personal farming and civilian clothing, shifted their roles between hermits, officials, gentries, farmers and merchants to seek a perfect identity. Finally, they did not become an absolute recluse, nor did they devote wholeheartedly to the reforming of local affairs, which reflected their confusion and introspection.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in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ations

ZHOU Shi-feng YANG Mian-yue(152)

The huge chunk paper from Japa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in the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in modern China. With the less developed manufactured paper in China, import substitution index at that time was very low and the paper imported from Europe and the US was confined to a low quantity and high priced. The shortage of supply led to the sharply higher price of paper, and even led to "paper shortage" during the boycotts. Ordinary people who took part in the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depended not only on the nationalism, but also on the mobilization of modern media. This strange phenomenon, i. e. the boycott-propaganda of the Japanese paper on the media did not match the purpose of boycott movement, and incompatible with the Anti-Japanese-Organization. Finite resistance greatly weaken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 of boycotts. Therefore, it manifested the economic plight in the national movemen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y. It is a hard choice among the citize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Research on the Assyrian Militaristic Culture

LI Hai-feng LIU Qi-liang(167)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Assyrians were a famous nation with a worship of force. The Assyrian Empire forces developed to its peak in the 9th to 7th century BC. The Assyrian army conquered the land from Mediterranean to Persian Gulf, and established the first great empire between Asia and Africa during the Iron Age. The Assyrians' militaristic culture exerted influence on all the aspect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The spiritual motivation of Assyrian was not only the key factor in establishing such a powerful empire, but also the chief culprit that led to its declining and downfall. Assyrian militaristic culture and a series of conquest largely affected the Near East historic development agenda.